

陈来◎主编

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

Zaoyi Daoxue Huayu De
Xingcheng Yu Yanbian

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

陈来◎主编

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 / 陈来主编.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336-4682-0

I. 早… II. 陈… III. 理学—研究—中国 IV. B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0336 号

责任编辑: 王竞芬

装帧设计: 朱 锦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

邮 编: 230063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40.5

字 数: 540 000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70.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2823297 2846176

目 录

前 言	1
周敦颐在宋代道学中的地位	13
一 周敦颐与道学的发展	13
二 周敦颐在心学中的地位	20
三 周程关系辨议	26
张载哲学中的“虚”与“气”	30
一 对佛老的批评	31
二 气之聚散与冰水之喻	37
三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42
四 太虚即气	50
五 结 语	58
吕大临《中庸解》简论	61
一 吕大临其人	63
二 《中庸解》的作者与版本	69
三 吕大临的《中庸》诠释	77
附论:关于“民鲜能久矣”一句的标点问题	105

北宋道学的“中和”说	107
一 中和与道、性、心	107
二 中和与动、静	114
三 物各付物	116
四 “涵养于未发之前”与“求中于未发之前”	117
五 结 语	119
 谢上蔡《论语解》的解释特点	121
一 “高迈卓绝”的解释方法	123
二 以“知仁”为重点的解释内容	135
三 工夫论的特点	141
四 结 语	146
 六、胡五峰的心性论	149
一 论性	150
二 论心	163
三 论心性关系	172
四 结 语	180
 朱熹的《仁说》与宋代道学话语的演变	182
一 二程的仁说	182
二 谢上蔡的仁说	190
三 杨龟山的仁说	193
四 吕大临、游定夫的仁说	197
五 胡五峰的仁说	199
六 朱熹的《仁说》	202

早期道学“穷理”说的衍变	229
一 二程的“穷理”说	229
二 张载的“穷理”说	243
三 程门后学的“穷理”说	262
朱熹的道体流行说	300
一 道体的含义	301
二 道体思想的来源	308
三 由体用论道体	313
四 道体流行的整体历程	324
五 道体兼体用	336
六 结 语	340
朱熹论心之本体与功能	341
一 人心本善	343
二 “神明”与“虚灵”	350
三 “主宰”与“知觉”	361
张栻的《太极解》	372
一 太极观念之历史	373
二 张栻太极说之基本观念	375
三 张栻与朱熹之太极辩论	386
四 《太极解义》之思想	390
五 结 语	402
张栻的中和说	404
一 二程的中和说	407

二 胡宏的中和说·····	409
三 张栻和朱熹的交流·····	414
四 早期中和说:先察识后涵养·····	417
五 晚期中和说:察识与涵养并进·····	424
六 结 语·····	430
黄榦的《〈论语〉注》·····	432
一 黄榦的生平与著作·····	432
二 朱子与黄榦之间的思想交流·····	440
三 黄榦的《论语》解·····	448
四 黄榦对朱子学之卫护和传播·····	465
陈淳的《北溪字义》·····	469
一 陈淳其人·····	469
二 《字义》的体系与结构·····	473
三 理气论思想·····	476
四 以“命”为本的“根原论”·····	482
五 论心之说·····	488
六 论知行关系·····	492
七 卫护师门,批驳象山·····	496
八 结 语·····	502
附 录	
一 《胡宏集》点校辨误·····	504
二 张栻《太极解义》·····	516
三 谢上蔡《论语解》集录·····	521
后 记·····	640

前 言

一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个最繁荣的时代,一个是先秦哲学的时代,另一个是宋明哲学的时代。宋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哲学思想家出现最多、思想水平最高的时代。所以,研究宋明哲学对了解中国哲学的整体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宋代和明代的理学是儒家哲学,它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新的发展,故在英文中,称其为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不过也应指出,理学虽然明确声明自觉承继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实际上理学思想体系也扬弃了经学、玄学、佛学及道教的思想。“扬弃”的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很重要,其意义是指既有抛弃,又有吸取。理学能够在宋以后获得这样的发展,正是因为它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营养。

魏晋时代玄学流行,玄学的思想和玄学所重视的经典,主要和《老子》、《庄子》有关,所以玄学基本上属于道家的思想形态。隋唐时代佛教盛行,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在思想界的影响尤大。同时,从魏晋到隋唐,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也不断地互相吸收和融合。玄学的本体论思维比较发达,佛教的心性论讨论比较深入,佛、道两家的思想对儒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儒家思想要有力地回应佛、道两家的挑战,就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新的发展。宋代的理学正是在古典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佛、道的有关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来的

新的儒家思想形态。

宋代学术的勃兴又与北宋前期的文化发展有直接的关联。北宋开国后大兴文教。宋太祖开宝四年刻宋版《佛藏》，共五千四百八十卷。宋太宗时编《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真宗时编《册府元龟》一千卷。天禧三年《大宋天官宝藏》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录成，是为道藏的先驱。仁宗时在汴京国子监刻石经，中有《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儒家经典的疏义也纷纷涌现。仁宗天圣五年御赐新及第进士以《中庸》，八年赐《大学》，此后不断。庆历时代解经风气一新，推尊孟子、韩愈，士大夫以通经学古、救时行道为己任，学术思潮丕然一变。仁宗庆历四年，令天下州县立学校。这一时期书院也开始发展起来。上述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北宋前期的文化繁荣，讲学和著述的风气一时盛行，为道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指出：“自从清代以来，道学和理学这两个名称，是相互通用的，现在还可以互相通用。”（第24页）而冯友兰自己则用“宋明道学”。他的理由是“道学”的名称出现早，而“理学”的名称出现晚，做历史工作的人最好用出现最早的名称；其次，他认为“道学”能显示出宋明儒学的历史渊源，因为“道学”的意思就是要承接孟子以后中断了的“道统”。

对此，我们在《宋明理学》中明确说明：“宋明理学，有人又称为宋明道学。其实，道学之名虽早出于理学之名，但道学的范围比理学要相对来得小。北宋的理学当时即称为道学，而南宋时理学的分化，使得道学之称只能适用于南宋理学中的一派。……所以总体上说，道学是理学起源时期的名称，在宋代它是理学主流派的特称，不足以囊括理学的全部。”（第8页）并指出：“由此可知，宋代道学之名，专指伊洛传统，并不包括心学和其他学派的儒家学者。”（第10页）

由此可知，宋代理学的主流，在当时被称为“道学”。不过，周敦颐、张载、邵雍都没有在学派的意义上用过“道学”这个概念。“道学”作为一个学派的名称，其流行始于二程的洛学，其影响的扩大，也有赖于二程学派。程颐曾经说过：“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祭李端伯文》，《程氏文集》卷十一）已经明确把道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和学说体系。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也说：“二先生倡

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中庸章句序》)朱熹的时代,道学已经是十分流行的名称了。所以,在历史的意义上,可以说二程是两宋道学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二程,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影响就建立不起来;没有二程,朱熹的出现也就成为不可能。一句话,没有二程,也就没有两宋的道学。

二程思想中人生论的探讨的比重,比起周、张、邵来说更为突出;从纯粹哲学的角度看,二程的宇宙论色彩也的确比周、张、邵来得淡。不过,从宋明理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二程与周、张、邵的最大的差别,是二程把“理”或“天理”提升为本体,这是使理学得以区别于魏晋玄学、汉唐儒学的重要根据。把天理确立为最高范畴,使之贯通天人,统摄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为儒家的价值理想提供了形上的依据,这才是理学之所以为新儒学的根本。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哲学中都没有把儒家的价值明确提升到哲学的最高地位,而二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宋代理学初期的发展,奠定了他们自己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从总体上说,二程用“理”这一范畴,作为最高的本体;以“理”来规定人性的本质;以“理”为万物的所以然;以穷“理”为知识论的主要方法,可以说,“理学”的体系和骨架已经由二程建立起来了。在二程的体系中,形上学的讨论更为深入,圣人境界提得更为明白,所谓“为学功夫”也渐鞭辟入里,总之,理学的基础已经由二程稳固地建立起来了。

被称为洛学的二程学派是北宋理学最重要的一个学派,程颢、程颐及二程的主要门人谢良佐和杨时构成了朱子之前道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洛学的出现和流传,真正代表了理学的建立和前期发展。在洛学中,后来理学所注重讨论的问题大都提出来了,或者说,洛学所讨论的问题,后来成了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但洛学弟子很多,来自不同地方,对二程的理解和继承也不一样,各自发展方向有异,所以二程死后的一段时期,洛学的话语渐趋分散,是很自然的。

二

理学在南宋前期的发展,在政治领域,表现为程颐之学与王安石之学的竞争;而在学术上,除了伊川学本身的历史沉浮和巨大影响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谢良佐、杨时的影响所主导的,特别是由杨时的影响及其对理学的传承所建立起来的。胡宏的父亲胡安国曾受谢、杨的很大影响,胡宏曾师杨时,朱熹更是杨时道南学派的三传弟子。杨时所承接的课题,如已发未发、格物致知,多是由伊川所倡发,但杨时进入这些课题的方向,亦与明道有关。而这些课题在他的影响下,成了南宋道学的主要课题。

谢良佐字显道,后来学者都称他为上蔡先生。他是程门中最有才华的,也是肯下大工夫修养自己的人。他本从明道学,明道很欣赏他,说“此秀才展拓得开,将来可望”。明道死后他又从伊川学,而后告别伊川回家,一年后又见伊川,伊川问他有何进步,他说这一年只是去掉一个“矜”字。伊川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的毛病全在这里。伊川叹赏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切问而近思’的人啊。”(见《宋元学案》卷二十四《上蔡学案》)可见二程对他都很赏识。

上蔡关于“仁”的思想发展了程颐的仁学思想。他的仁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提出“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这是“以生论仁”,认为从天道观的方面来看,仁表示宇宙的生生不已的本性,这是对程颐以理为宇宙生生之理的思想的明确的发展;另一方面,他继承了明道借医家“手足不仁”之说,以仁为感通的思想,提出“心有知觉之谓仁”(《宋元学案》卷二十四),这是“以觉言仁”,从伦理的意义上说,仁表示意识的一种境界或状态,即觉,这个觉就像知觉到肢体的痛痒一样,去关爱与自己为一体的万物。“以觉言仁”和“以生论仁”是上蔡仁说的特色与贡献。

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先生。杨时进士之后,先到河南去拜见明道而师事之,明道很喜欢他,认为他领会最快。后来杨时离别明道回其福建老家,明道目送

之曰：“吾道南矣”，相信他会把道学传播于江南。黄百家在《宋元学案》的《龟山学案》的按语中说：“二程得孟子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得，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则大程‘吾道南矣’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谶也。”就是说，程门弟子虽各有所得，但只有杨时门下后来出了朱熹，真正发扬光大了道学，这样看来，“吾道南矣”确实不是虚言。

杨时对二程学说的承继，主要是对程颐的一些思想的发展，这与谢上蔡主要发展程颢的一些论说不同。程颐关于“涵养未发”的问题意识对杨时影响很大。杨时很重视“未发”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体验未发”：“惟道心之微，而验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则其义自见。”（《宋元学案》卷二十五）又说：“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同上）。这就是说，《中庸》所说的“中”，人要在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去体验，体验到“中”以后，保持勿失，不要有私欲，这样已发就可以中节了。杨时的方法，是要人努力超越一切意识活动，平静思维和情绪，体验没有思维和情感活动的内心状态，在这种内向的直觉体验中，人就能体验到中，保持它而不使丧失，人就达到完满的境界。杨时的这种思想，对南宋的理学有重大的影响。不过，杨时的这种修养功夫，比较偏于静中的功夫，与程颐的主敬持敬说，毕竟有所不同。

胡宏号五峰，是南宋前期朱熹以前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全祖望说：“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宋元学案》四十二，《五峰学案》序录）南宋与朱熹同时的吕祖谦认为胡宏的著作《知言》胜于张载的《正蒙》。秦桧主政时，曾笼络胡宏和胡宏的兄长胡寅，但二人都回避不理。因此胡氏兄弟的声名播于四方。胡宏在五峰讲学二十年，建立了湖湘学派，与杨时的嫡传道南学派，并为当时的最大的学派。洛学在南宋的学术流传，正是依赖于这两派的学者。

胡宏对“已发未发”的重视明显受到了杨时的影响。但是他与杨时着重讨论未发的功夫不同，他更多地讨论“未发”的概念，比如，未发是心还是性，这个问题在程颐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加以讨论，胡宏则进一步加以探究。在功夫上胡宏自己偏重于已发的察识功夫。

三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他 14 岁时父亲亡故。父亲死前,命他受学于三个朋友,说“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这三个人是胡宪(籍溪)、刘勉之(白水)、刘子翥(屏山)。这三个人便成了朱熹的最早的老师,称为三君子。三君子和朱熹的父亲朱松都倾心于洛学,那个时候,洛学还在受禁,不能公开学习,他们就暗地里学习。受这些影响,朱熹很早就对洛学有了兴趣。不过,三君子的思想比较驳杂,胡籍溪、刘屏山都对佛老感兴趣,这些也曾对青年朱熹有影响。

朱熹青少年时代从学于三君子,三君子之一的胡籍溪曾学于胡安国,所以《宋元学案》把朱熹也算做胡安国的再传。其实,从思想和学术上说,朱熹所直接承继的是杨时开创的道南学派。朱熹 24 岁时见李侗,李侗是罗从彦的弟子,罗从彦则是杨时的传人。朱熹自见李侗后,以李侗为师,一心归于洛学。李侗把“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即体验喜怒哀乐未发,传教于朱熹,又引导朱熹研习圣人的经典。李侗对朱熹评价甚高:“元晦进学甚力,吾党鲜有”、“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朱子年谱》卷一上)所以朱熹是杨时的三传弟子,是二程的四传弟子。

杨时倡道东南,游其门下者,有很多人,罗从彦是最得其传者。罗从彦从龟山学,讲诵之余,危坐终日,以体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李侗从罗从彦学,也是默坐澄心,体验未发。李侗又以此教朱熹。朱熹对此也下了很大工夫,可是朱熹对于体验未发的理论和实践,总觉有所未契。李侗死后,他结识了胡宏的弟子张栻,受到湖南学派的已发未发说的一些影响。他仍不满足,在整理、编辑二程的语录过程中,反复体会程颐的语录,最终在 40 岁的时候,确定了走程颐“主敬一穷理”的思想方向,由此开始,逐步建立起了他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朱熹的思想又是在与当时理学各派学者的交流互动中,通过广泛吸收各派思想成果,并对各派进行批判的综合中建立起来的。

在朱熹成熟的已发未发说中,朱熹主张,“已发”是指思虑已萌,“未发”是指思虑未萌,即以已发、未发指心理活动的不同状态。这种关于已发未发的观点是为了给静中涵养工夫一个地位。因为如果以心为已发,人的工夫便只在已发上用功,就容易只注意明显的意识活动的修养,而确立了未发作为思虑未萌时的意义,就可以使人注意从事未发时的涵养。这样他就把道南学派注重未发工夫的思想和湖南学派注重已发工夫的思想结合起来了。朱熹虽然通过重新定义已发未发,把未发功夫和已发工夫都兼顾到,但他对未发工夫的强调已不是道南学派体验未发的主静之功,而是程颐讲的主敬。他对已发工夫的了解也已经不是湖南学派的察识良心,而是程颐说的格物穷理。他主张,未发时要主敬涵养,已发时要格物穷理。这样一种思想,实际上是继承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为学宗旨。所以他做学问的方向最近于程颐。

四

宋代道学从北宋到南宋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宋代道学话语的定型是在朱熹手上完成的。

北宋的道学运动以二程代表的洛学为中心,到南宋初年,以程颐和张载影响最大,而程颐和张载相比,程颐的影响又更突出。据反道学者何若绍兴十四年上奏称:“盖始缘赵鼎倡为伊川之学,高闲之徒从而和之,乃有横渠正蒙书、圣传十论,大率务为好奇立异,流而入于乖僻之域、虚幻空寂之地。”横渠正蒙书即张载的《正蒙》,圣传十论即朱熹早年老师刘子翬所作的《圣传论》。后来淳熙中陈贾攻击道学:“伏见近世士夫有所谓道学者,大率类此。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当然,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他所说的道学主要是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话头为实践的功夫。而淳熙末林栗攻击朱熹:“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以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以上皆见《道命录》)这更指出当时的道学是以程颐

和张载的思想为其领率，这自然主要是指朱熹而言。

由于伊川学成为南宋道学的代表，于是曾做过二程老师的周敦颐及其著作在绍兴后期已经被包容到道学系统中来。绍兴以后，在广义的道学运动意义上，洛学讲友邵雍、司马光之学也被列入其中，故胡安国上奏说：“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宋元学案》三十四，《武夷学案》）乾道中出版的道学丛书《诸儒鸣道集》，在濂溪、横渠、二程、上蔡、龟山外，亦收涑水、元城著作，故朱熹早年曾有六先生的说法。但就绍兴以后道学思想的实际影响而言，仍以二程后学中的谢上蔡和杨龟山为中坚，上蔡的亲传学生除朱震外，传承多不详，但他影响了胡安国，湖湘学派的后来发展受上蔡影响甚大，与朱熹同时的湖南学者都坚持并捍卫上蔡思想，故湖南学派几乎可以说是南宋前期传承上蔡思想的主力。龟山三传而得朱熹，道南学派发展到朱熹，在当时的思想家群中，经过竞争而独出于众人之表，最后成为大宗。

因此，虽然在思想上可以说上蔡、龟山、五峰是南宋前期道学中影响最大的三派，但道学在南宋前期的实际发展，以湖湘学派和道南学派为两支主干。在话语上，上蔡重视《论语》的仁说，龟山重视《中庸》的已发未发说；前者重视穷理，后者重视格物；前者重视觉仁，后者重视诚意；五峰重视已发，龟山重视未发。当然湖湘与道南两派也有交叉，如湖湘学派最重要的哲学家胡宏，曾学于杨时，故其思想中既有论仁之说，也很注意未发已发等说。南宋前期理学特别关注的是道与日常事物的关系问题、心性关系的问题、言仁求仁的问题、性善气质的问题。

由与湖南诸公论中和开始，继而全面反省湖南学派的经典《知言》，最后与湖南学者论仁说，朱熹在早期吸收、消化湖南思想之后，在乾道末年全面地对湖湘学派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并特别对湖南学派推重的上蔡思想进行了批判。由朱熹主导的，张栻、吕祖谦等共同参加的这三次对湖南学派的批评审查，在南宋思想史上是很重要的事件，是朱熹克服道学内最大对手、说服同时名士讲友而跃居领袖地位的关键。因此，朱熹的思想是在从北宋到南宋儒学或道学发展的具体语境和脉络中生长起来的，是面对这一时期儒学和道学所具体面临的挑战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对先秦儒学资源的一种抽象的选择。我们今天回头来

看,只有朱熹在总结综合了北宋以来道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全面的体系,才能使儒家成功回应佛道二氏的挑战,适合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这是其他任何一派包括陆学都不能承担的。

比较北宋道学家群内部的论述,周敦颐、张载、邵雍更多的是从《周易》和《易传》出发,故其话语带有明显的易学色彩,思想的讨论中宇宙论的色彩比较强。而二程的论述明显突出《四书》的重要性,心性和功夫的讨论比较多。由于二程兄弟的影响最大,从北宋到南宋前期,道学的话语既以《四书》为其中心,又以二程及其后学对《四书》的阐发为主流。而道学发展到朱熹的青年时代,话语的重心已集中于“中和说”和“仁说”,朱熹青年时集中思考的即是这两者。朱熹从40岁到44岁先后进行的两大论辩,即与湖南学者论中和说、与湖南学者论仁说,都是围绕这两者进行的。朱熹通过全面消化二程的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方面,深化了道学创立以来在这两大问题上的思考。在综合了道学各派的讨论基础之上,他提出了既本源于二程又能针对于当时的偏病的中和说与仁说,因而得到了当时一流思想家的认同。此后尽管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朱熹的中和说和仁说在相当程度上通过综合总结而使得这两大问题的讨论趋向结束,从而开始了新的理论课题和话语构建。这些理论课题就是朱熹中年以后所发展出来的理本气具论、心统性情论、即物穷理论等,对这些课题的讨论所构成的话语,比起洛学来说,更大量吸取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的易学宇宙论,使得道学的话语更加哲学化。这一套打上朱熹印记的综合性道学话语,由于朱熹巨大的思想力量 and 影响,以及此后各代王朝的推崇,逐渐成为此后理学的主导话语,型塑了近世知识人的问题意识,历经元明清而成为宋明理学的主流。

五

本书所要研究的课题,是道学史取径下的道学话语之形成的问题。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基于若干的社会—思想条件,就思想方面来说,如二程、张载道

学思想的创立,周敦颐、二程人格与境界的感召力,道学精神对宋代知识人的吸引,都对道学作为一种思潮和话语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道学内部的讨论,其讨论的问题的变化由分散到集中,具体规定了道学话语的内涵。早期道学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若干确定的主题,并在早期传承中构建和形成了前期道学的核心话语,如仁说、中和说等,提供了道学从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发展的重要动力。探讨这一话语的具体形成、发展和蜕变,是研究早期道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除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田浩教授在其《朱熹的思维世界》中,浙江大学何俊教授在其《南宋儒学建构》中从不同的角度作过若干探讨外,学术界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仍需深入和拓展。

本书的研究,希望借鉴话语研究的方法,使宋代道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具体化,并使得对宋代道学前期发展的零散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获得方向和整合,从而使目前宋代理学的研究在单一的研究范式的状况下摆脱出来,走向新的、更为活跃的状态。这里所说的话语研究方法与西方话语理论关注文本与权力结构、符号与社会制度的联结不同,主要从学术陈述本身来看话语构型。从这方面来看,意义表达为陈述,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命题是陈述的形式化凝结,话语统一性和连贯性来自命题、陈述的共同风格和共同主题,来自问题意识上的共识,也来自对关键概念使用的共同偏好,从而形成了话语体系。任何话语都是经过散杂、剔除、积累、集中的过程,才逐渐形成各个领域的话语系统。而话语体系的形成和传延,在中国又是和学派传承的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道学无疑是一种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的过程,很值得加以细致研究,并总结出、提炼出作为中国学术思想的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从理论意义上说,此种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接近道学这一思想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原貌与全貌,也可使我们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道学研究具有更多的对话和交流机会。在研究道学话语的形成过程方面,本书很强调通过经典解释案例的解剖,进行儒学观念史的研究,因为道学话语的单位往往都来自经典本身,从而经典和诠释的视角必然在道学话语形成的研究中占一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从传统经学的角度加以研究,而是注重比较和了解各家在主要儒学观念上的异同,以明确经典解说这一形式在道学话语形成中的作用和意义。当然,在这些方